



现代快报

A32

2013.7.20 星期六

责任编辑 柳林
美编 张晓雅 组版 黄伟



1954年生于南京，别署二乾书屋主人。中国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、教授，研究生导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其艺术创作追求贯通古今，兼修中外，形质并重，发乎性情。



《朝露》

奋力笔墨所透发出的生命力度和深度

——读张友宪画作有感

□樊波(南京艺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我初到南艺黄瓜园时，南艺校园还不是现在这样大厦矗立，而是树木如盖，进门沿坡行走可以看到灼灼桃花、蔽日的松树和芭蕉。在这一片景致中，我经常看到一位年轻的画家往往身置竹林之中，面对芭蕉挥笔抒写，而身形却凝然不动，全神贯注，仿佛要与芭、竹融为一体。这使我由然想起苏轼之言“神与万物交”“其身与竹化”——他就是我后来渐渐熟识、而今已闻名画坛的张友宪。

石涛在《画语录》中将中国画的用笔问题提炼为一个抽象范畴：“一画”。他说“一画者，字画先有之根本也”“人能从一画具体而微，意明笔透”。还说：“我有是一画，能贯山川之形神”，“以一画测之，即可参天地之化育也”。可以说，不懂得用笔，也不能把握“一画”，将用笔提升到“一画”的高度，就能参透天地、山川的形神和化育的根本。因此来讲，用笔不只是一个技法问题，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画的基本命脉。我深信，友宪正是从这种高度上来理解和重视用笔问题的，我记得友宪多次与我谈起唐人张彦远的一段话“骨气形似，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”。张彦远这段话与石涛之言是相通的，他也没有将用笔仅仅归结为一个技法问题，而是将之与中国画的“骨气”“形意”这样一种本体精神紧密相连。作为画家，友宪乃是从绘画实践中深刻体悟到用笔的丰富内涵和美学价值的，在这方面他与这些先贤大师是心心相印的。著名画家周京新曾对我说：“友宪的用笔质量在全国来讲，是屈指可数的一位。”在南艺黄瓜园，如果说周京新多以墨取胜（当然并不排斥用笔）的话，那么友宪则以笔见著（同样也不排斥用墨）。

在画史上，据史料所载，吴道子以笔为胜，项容则以墨见长，“八大山人长于笔，清湘大涤子长于墨”。可见一个画家只要在用笔或用墨上达到一种高度，就能在画史上立住脚跟，中国画创作，人人皆需用笔用墨，但并非人人皆能锤炼出一种笔墨高度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友宪对画史上一些以笔取胜的画家推崇不已，在古代，他推崇顾恺之、吴道子，他们的用笔皆达到了一种与天地万物象参化合的审美高度；在现代，他推崇刘海粟、吕凤子的用笔；而在我这里，则推崇张友宪，友宪的用笔与物宛转，但又不质不形，如飞如动，透发出激越、奋力的风调，这种风调使他的作品自然拥有一种卓立的风格气象。我一直认为，一个画家的风格形式，与许多因素如造型方式、题材选择、环境气质相关，但从最切近的意义上讲，却是与笔墨相连的，尤其是与用笔直接贯通，一个人如果用笔有了某种风调——一种从内在生命中吐露出来的、具有特有形态的用笔风调，那么他的绘画风格就必然会彰显而出。

友宪对于用笔的关注，实际上是与他对生命、人性的体察相联系的。据我所知，友宪在白描上具有精湛的功力，素描亦有很高造诣，造型严谨、笔触精细，绝非常人所能及也，但他却并不满



《慈悲为怀》



《节节高》



《欧洲写生》系列之一

足于此。在他看来，这种古典的表现手法与他内在的生命本性总有某种隔膜之感。因而几乎是同时，友宪已然在追求一种与生命内涵相合的、真气勃勃的笔墨形态了。我们从他早期素描作品《父亲》肖像中即可见到那种欲求挣脱谨严法度的生命彰显的表现主义倾向。在中国画的创作中，他将这种倾向定位而称之为“大写意”，写意之“大”正在于生命本身的力量和深度，也在于生命所渗透于表现物象的深度和力度，更在于与之结合的用笔之深度和力度。

这几年友宪担任南艺美术学院院长，事务繁杂，然于绘画创作却从不懈，他经常带学生外出写生，归来后结集成册，观之自然生动，真切如睹，虽为小品，却仍是八面开锋，墨瀕生色。友宪正是这样，他那高质量的笔墨表现和奋力激越的绘画风格形成不是偶然的。它能将一切写生的、长期休养而积蓄起来的艺术能量汇聚一体，诉诸于笔端，他能将传统的精粹和现代的人生感悟集中于一点——绘画创作真正成为他生命表白的自由载体。正是这样，你与友宪交谈、你看友宪的画作，会明显感到透出一种底气和信心。目前画坛不少人自以为名家、大家，现代媒体也确能将这些人拥推到这样的名分地位，然而他们大都是“气韵精灵，未穷生动之致，笔路纤弱，不副壮雅之怀”。友宪有一则书法题跋，很好地表露了这一点，“余观今日各类刊行之作，深虑其笔墨也。数年来，画人每为孔方兄所累或有合意之构，亦多泛泛之笔耳。”的确，与友宪相比，他们其人其画多缺乏一种真正的底气和自信。在我看来，这种底气和自信才是一个大家所应有的人格风范。敢问诸君，你们从友宪作品中，是否可以验证以上我之所言呢？



《放眼世界》书法